

革命與詩的失落——魯迅、斯諾與中國新詩

陳智德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

「魯迅認為研究中國現代詩人，純係浪費時間。……
除了他們自己外，沒有人把他們真當一回事。」
——斯諾著、安危譯〈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

引言

一九三六年五月，魯迅（1881-1936）逝世前數月，美國記者、《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 另譯《西行漫記》）的作者艾德加·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帶著妻子海倫·斯諾（Helen Foster Snow, 1907-1997）擬定的問題單，從北平來到上海，訪問魯迅，這次歷史性的訪問成了魯迅最後一次有系統地發表對文壇的意見。魯迅在回答中一再表達他對新詩的失望，斯諾引述說：「魯迅認為研究中國現代詩人，純係浪費時間」。魯迅在該次訪問中語調大多平和，即使問及他所不甚認同的徐志摩、林語堂等人，他也沒有負面評語，唯提及新詩時語帶激憤。

魯迅本身是早期新詩創作者之一，他為什麼對新詩這樣失望？斯諾的訪問稿塵封多年，一九八七年連同海倫的問題單首次發表於《新文學史料》，隨引起文壇反響，卞之琳、臧克家等作家對魯迅的新詩批評頗多感喟，卞之琳認為「唯提筆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詩人」一語「確像是魯迅的筆調，說得很妙，切中時弊。在今日中國，這種現象還比比皆是。」臧克家則提出三十年代新詩的發展歷史來補充魯迅「對新詩一筆抹殺」的言論。

然而，該次訪談記錄本非純粹客觀的記錄，細讀問題單和訪問整理稿，魯迅答問間還雜有斯諾的「傾向性意見」，對新詩不甚滿意的原也包括了斯諾本人。魯迅的確在訪談中表達了對新詩的失望之情，但不能孤立來看，還須結合他自〈摩羅詩力說〉至一九二五年的〈詩歌之敵〉等文，以至其對革命文學的看法而論，而更關鍵的，也許是一九三六年三月間，即斯諾來訪前兩月，魯迅誤信出版殷夫（即〈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所哀悼的左聯五烈士之一白莽）遺作而被騙取文稿一事。魯迅言及新詩所表現的失望，也許只是一種反詰式的哀悼。

魯迅以小說和雜文聞名於世，他的新詩創作及其後的批評，卻幾近成為一種被遺忘的文本。一九一八年，魯迅首次使用「魯迅」之署名，在《新青年》四卷五號發表《狂人日記》，成為後世傳頌的名篇，而較少人留意的是，就在同一期《新青年》，魯迅還以另一筆名「唐俟」發表了三首新詩，至一九一九年再發表了另外三首，共六首新詩。魯迅的新詩在早期白話文運動中被視為一種範例，分別選入了許德鄰編《分類白話詩選》（上海崇文書局，1920）、新詩社編《新詩集》（新詩社，1920）和康白情編的《新詩年選》（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一九三五年朱自清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時也參考了這些早期選本，並選入了魯迅〈夢〉、〈愛之神〉和〈他〉三詩，在〈導言〉中把魯迅歸入「自由詩派」。

早期新詩作者，如胡適、劉半農等，大部份仍帶著濃厚的古典詩詞影子，這點胡適在再版的《嘗試集》中也承認。¹五四初期作者實以白話詩作為一種語文上的實驗，用以證實白話文的效用，正如胡適所說：

現在我們的爭點，只在『白話是否可以作詩』的一個問題了。白話文學的作戰，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現在只賸一座詩的壁壘，還須用全力去搶奪。待到白話征服這個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說是十足的了。²

「白話文的仗」已勝十之七八，最後餘下詩，「白話是否可以作詩」成最後的爭議。當朱自清回顧新詩第一個十年的發展時，首先注意到早期作者在「給詩找一種新語言」上的努力，他提出胡適和康白情的作品皆非成功例子，「只有魯迅氏兄弟全然擺脫了舊鏢鏑，周啟明氏簡直不太用韻。他們另走上歐化一路。走歐化一路的後來越過越多。——這裡說的歐化，是在文法上。」³

結合當時中國新詩的情況，才可看出朱自清認同魯迅詩作之所本，是在於新詩語言上的創建。從今日的目光觀之，新詩語言其實也並非不可自舊詩承傳，不過當時新詩的功用是作為白話文能否完全取代文言文的一種實踐，其語文意義重於文學意義，所以較純粹的白話文語言運用成功與否，是評價新詩的關鍵，這也是朱自清稱許魯迅兄弟的主要著眼點。

魯迅的新詩創作量少，成績不及其小說，不過若從早期新詩作為一種白話文語言的實踐及當時人的要求而看，魯迅的新詩創作應是成功的。然而魯迅對詩歌的要求不止於語文，而更在乎精神態度上的意義，這可分兩方面來說。

魯迅早在留日時期所寫的〈摩羅詩力說〉，詳細說出他對詩的期許。他舉出

¹見胡適〈四版自序〉，《嘗試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上海：上海書店，1982年重印本），頁2-3。

²胡適〈逼上梁山〉，胡適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1935／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頁19。

³朱自清〈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上海：良友圖書，1935／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頁3。

多位歐洲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詩人如拜倫、雪萊、裴多菲、普希金等為例子，指他們都具「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特質，在魯迅心目中，詩歌不只是詞藻華麗的句子，他更強調詩人的抗世本質：「大都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拒俗，而精神復深感后世人心，綿延至于無已。」⁴魯迅又舉出十九世紀普法戰爭中德人以國民素質取勝的說法：「國民皆詩，亦皆詩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此豈篤守功利，擯斥詩歌，或抱異域之朽兵敗甲，冀自衛其衣食室家者，意料之所能至哉？」⁵，魯迅強調單純的武力不足致勝，德人以詩歌改造國民性，精神力量的優勢才為真正強盛之途。由此或可見魯迅對詩歌的態度本出另一路向，從思想著眼，目標在改造國民性，改變「順世和俗之聲」，強調爭天拒俗，當中的革命思想當與清末革命浪潮相關。

另一方面，詩的抗世力量不是一種狹義的政治革命，而是從內在改善世道人心的精神力量：「蓋詩人者，撓人心者也。……詩人為之語，則握撥一彈，心弦立應，其聲激於靈府」⁶，〈摩羅詩力說〉以詩為「心聲」，並多次強調，「心聲」的說法可與〈文化偏至論〉中的「內曜」互相參照，至其留日時期最後一篇論文〈破惡聲論〉中，魯迅再將「心聲」與「內曜」放在一起論說：「內曜者，破瘵暗者也；心聲者，離偽詐者也。」相對於「爭天拒俗」之說，「心聲」與「內曜」則為詩更根本內在的力量，強調洞悉偽假幻象，與「爭天拒俗」同樣指向國民性的改造。

魯迅所心慕的摩羅詩人正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然而詩更重要的是一種精神態度，即如他在〈破惡聲論〉指「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也是指向精神態度。⁷〈摩羅詩力說〉末段提出「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差不多十年後，他在五四前夜發表於《新青年》的六首新詩，大抵可見其「心聲」與「內曜」，卻不太見出有「爭天拒俗」的內容，我認為由於當時以建立白話詩語言為首要目標，魯迅所作白話新詩，走的是當時主流，即以新詩為白話文實驗的路，未在詩中注入抗世內容。

魯迅後來未有繼作新詩，一方面把爭天拒俗和破除偽假的抗世內容放諸小說，⁸另一方面亦對五四之後的詩壇感到不滿，尤其是新月派：

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歡做古詩——只因為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到各處投稿，《語絲》一出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贊成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和他開

⁴ 〈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66。

⁵ 同前註，頁 70。

⁶ 同前註，頁 68。

⁷ 參伊藤虎丸著、孫猛等譯《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82-101。

⁸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511。

一通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果然不來了。這是我和後來的「新月派」積仇的第一步。⁹

魯迅在〈集外集序言〉說自己不喜歡做新詩，也不喜歡做古詩，未必是實情，至少對寫舊體詩仍有興趣，這說法和他多次稱自己為詩壇外行（見〈詩歌之敵〉）、不喜歡做新詩（見〈集外集序言〉）、不懂詩（見〈白莽作《孩兒塔》序〉）以至不同文章中提及對新詩的批評，多少屬於魯迅式的反話或意含諷刺。魯迅當然是懂得詩的，〈集外集序言〉的說法其實意在將自己心目中的詩與新月派詩風分別開來，因為魯迅不滿於二十年代的新月派所做成的較講求形式和詞藻的風氣，迥異於他心目中「爭天拒俗」或講求心聲、內曜的精神素質的詩。由是看來，魯迅說自己不喜歡做新詩，應是出於對當時以新月派詩風為時尚的新詩壇感到不滿，因而意興闌珊的反話。

二

魯迅不滿於二十年代的新月派詩風，然則他心目中所期許的詩又是如何的呢？一九二六年，魯迅在一篇介紹蘇聯詩人勃洛克（Blok,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長詩〈十二個〉的文章中說：

他之為都會詩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詩底幻想的眼，照見都會中的日常生活，將那朦朧的印象，加以象徵化。將精氣吹入所描寫的事象裡，使它蘇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塵囂的市街中，發見詩歌底要素。所以勃洛克所擅長者，是在取卑俗，熱鬧，雜沓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秘底寫實的詩歌。中國沒有這樣的都會詩人。我們有館閣詩人，山林詩人，花月詩人……；沒有都會詩人。¹⁰

魯迅在文中兩次強調中國「沒有都會詩人」，在評介勃洛克的同時，實也表達對當時中國詩壇的不滿。魯迅心中另有圖像，他所稱許的都會詩不單在於寫實描述，更重要在於寫意和象徵：「將精氣吹入所描寫的事象里，使它蘇生」，魯迅指中國沒有像勃洛克這樣的都會詩人，一方面肯定勃洛克，但更最重要是提出對文壇的擔憂，寄語於中國新詩，提出寫實、社會性與藝術性結合的創作之路，而當時詩壇正走向兩極。

回看魯迅早期於《新青年》發表的新詩〈夢〉，主要描寫革命形象及當中的變化，有如〈在酒樓上〉的早期革命知識份子形象。魯迅以前夢、大夢、後夢分別象徵革命的形象及其不同階段，三者各有微細的不同，而最後的夢則還原

⁹ 〈集外集序言〉，《魯迅全集》第七卷，頁 4-5。文中提到和徐志摩開玩笑的雜感，即一九二四年刊於《語絲》周刊第五期的〈“音樂”？〉一文。

¹⁰ 〈《十二個》後記〉，《魯迅全集》第七卷，頁 299-300。

為理想的破滅。魯迅的〈夢〉及其餘發表在《新青年》的新詩，有別於當時其他早期新詩的嘗試者，在於對現象的描述方式，往往採取較曲折手法而沒有正面描述，及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所作的散文詩《野草》系列則有更明顯的象徵主義傾向。

魯迅對勃洛克〈十二個〉的稱許可見其結合象徵與寫實的詩觀，也見其所肯定期許的詩風，為象徵、革命和想像的調和。他對館閣詩人，山林詩人，花月詩人固然不滿，即對於革命文學亦很懷疑，也不贊同以詩作政治宣傳：「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¹¹

在革命的戰鬥性和個人浪漫感興之間，魯迅不提供單一答案，他自己的實踐還是重視文學本身的規律。更重要是：象徵不與革命衝突，當談論文藝，無論是革命的文學或其他，如其「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¹²一切還須回到文學的規律去考察。

作為早期的開拓者，魯迅對新詩有很大期望，〈《十二個》後記〉一文也表達他理想中的詩世界。魯迅早期的新詩試作在於配合白話文實驗的嘗試，日後中國新詩由於時局的影響，走向革命、寫實或浪漫、現代的兩極，魯迅對新詩的失望，由一九二五年的〈詩歌之敵〉等文，貫徹至一九三六年接受斯諾訪問時的言談，後者是研究魯迅晚年心境的重要文獻，細讀其談話記錄，似乎不僅是對新詩失望，卻結合了他對革命理念和純粹詩歌世界的雙重失落。

三

艾德加·斯諾（Edgar Snow）是著名的與中國共產黨友好的美國記者，他一九二八年初訪中國上海，其後到過西北、台灣、廈門、廣州、雲南等地採訪，一九三二年首次與魯迅會面，三六年採訪宋慶齡並再與魯迅會面，同年赴陝北中共根據地採訪了毛澤東、彭德懷等人，留下重要的記錄和影像，成為西方世界認識中共的重要依據，三七年在倫敦出版《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其後中譯本《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突破了國民政府對中共訊息的封鎖。

一九三三至三七年間，斯諾任教於燕京大學新聞系，一九三二年首次與魯迅會面後，已開始計劃編譯中國現代小說選集，其後與姚克合作展開翻譯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在倫敦出版《活的中國》（*Living China*），該書收錄魯迅、柔石、茅盾、丁玲、巴金等人的小說，並附海倫以 **Nym Wales** 為筆名發表以西方讀者為對象的論文〈現代中國文學運動〉，¹³她對中國文壇頗多疑問，曾向蕭乾、楊剛等人求問。一九三六年四月，斯諾到上海訪問宋慶齡和魯迅，臨行

¹¹ 〈文藝與革命〉，《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84。

¹² 同前註。

¹³ **Nym Wales** 本是海倫在西方報刊發表中國報道時常用筆名，她亦用此筆名出版了 *Inside red China* 等多種著述。

前，海倫交給斯諾一份列出二十三項提問的問題單，請他帶到上海就教於魯迅。

海倫本身是詩人，也很關心中國新詩的情況，故問題單上列出不少有關新詩的問題，其中問到「最優秀的詩人」，魯迅的回答是「冰心、胡適、郭沫若。」然後再補充：「不過，他們的詩作，沒有什麼可以稱道的，都屬於創新試驗之作。」斯諾記述云：「魯迅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現代詩歌並不成功。」問及「法西斯主義詩人」，斯諾記述云：「沒有法西斯主義詩人。魯迅認為研究中國現代詩人，純係浪費時間。不管怎麼說，他們實在是無關緊要，除了他們自己外，沒有人把他們真當一回事，『唯提筆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詩人。』」在問題單的後面，還有若干有關新詩的問題，但記錄甚簡，如「左翼詩人：蒲風。」在問題編號十七，可能因為問題重覆，或魯迅無意再答，斯諾記述云：「他已經闡述了他對現代詩歌的意見。」¹⁴

斯諾上海之行的最主要目的，實為到陝北蘇區採訪的計劃作準備，回到北平後，他透過宋慶齡的轉介，經另一中介人取得了「劉少奇授權柯慶施（北方局組織部長）用隱色墨水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並轉達了歡迎他去陝北蘇區訪問的邀請」¹⁵，六月三日，斯諾暫別了妻子海倫，從北平坐火車出發，開展西北之行。海倫也根據斯諾訪問魯迅後的整理稿，在六月份完成了〈現代中國文學運動〉一文，先發表在倫敦出版的 *Life and literature to-day* 雜誌，再收錄於《活的中國》一書。

在〈現代中國文學運動〉一文的後半段，海倫引錄了魯迅的回答，如指中國新詩並不成功。¹⁶斯諾在一些文章中也曾提及這次訪問，¹⁷不過詳細的訪問記錄埋藏多年，直至八十年代中才由安危自海倫的檔案中發現，及後經過翻譯、整理，一九八七年全文首次公開於《新文學史料》，分為〈埃德加·斯諾採訪魯迅的問題單〉及〈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兩部份，前者是海倫列出的原始提問稿，後者是斯諾的訪問整理，比對下可見海倫〈中國現代文學運動〉一文只引錄了小部份。〈問題單〉及〈談話整理稿〉刊出後立即引起學術界強烈反應，八七年九月舉辦座談會，卞之琳、臧克家、唐弢等老作家和學者出席發言。魯迅對中國新詩失望的言論，「唯提筆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詩人」的說法，尤其引起卞之琳的感慨：「在今日中國，這種現象還比比皆是。」¹⁸

自五四運動以來，相比於小說和散文，新詩引起的爭議、誤解以至蔑視，長期未息；無論在社會上或學院中，文學的創作、出版、閱讀和教學各方面，新詩也有被邊緣化的傾向：詩集滯銷，詩作缺少評論，新詩課缺少學生，魯迅最後給我們留下的「新詩危機」很值得深思。新詩當然有自己的問題，魯迅所

¹⁴ 安危譯〈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3期，頁7-12。

¹⁵ 武際良《斯諾傳奇》（北京：華藝出版社，1995），頁157。

¹⁶ Edgar Snow (ed.) *Living China*. Westport, Conn., Hyperion Press, 1973. pp.347-349.

¹⁷ 見埃德加〈向魯迅致敬〉、〈魯迅印象記〉等文，收錄在史沫特萊等著《海外回響：國際友人憶魯迅》，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¹⁸ 〈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座談會記要〉，《新文學史料》1988年第1期，頁213-221。

言亦固然針對一九三六年的情況，然而，研究中國新詩，真的「純係浪費時間」嗎？

座談會中，有作家、學者對這份訪問記錄的客觀性和準確度表示懷疑，整理者安危也提出，文件中可能雜有斯諾個人評語和對妻子的提示。安危認為訪問記錄中，「魯迅認為研究中國現代詩人，純係浪費時間」這說法可能並非魯迅原話，而是斯諾的「傾向性意見」：「規勸妻子不要再去研究中國現代詩歌了。」¹⁹這說法很有趣，若然的話，竟是一個對中國詩不甚了了的男子，感到被妻子的喜好浪費了時間，而假借魯迅之口作出一點反抗；那麼這訪問記錄不只關乎魯迅，也是研究斯諾夫婦的材料了。斯諾與海倫於一九四九年離異，文學見解的分歧可能會是原因之一？

訪問記錄的確雜有斯諾的「傾向性意見」，不過，訪問記錄保留了許多魯迅的真實談話，這一點該座談會也予以肯定。在新詩部份，卞之琳認為「唯提筆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詩人」一語「確象是魯迅的筆調，說得很妙，切中時弊」²⁰，魯迅研究者陳漱渝也贊同卞之琳的看法，認為該語「符合魯迅的思想，是一種『魯迅式的偏激』」²¹。熟悉魯迅文風的讀者都不難看出這種「魯迅式的偏激」，這樣理解的話，或可解釋前文提出魯迅對新詩否定的說法，正如前文提及魯迅一再稱自己為詩壇外行、不喜歡做新詩包括舊詩、不懂詩等說法，不是指真的是外行或不懂詩，而是一種魯迅式的反話或意含諷刺；這份訪問記錄提及對新詩的否定，在說話背後也許另有其他含意。

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一段日子中，魯迅始終對革命文學的說法抱持懷疑，在〈文藝與革命〉、〈革命文學〉等文中一再強調文學先於革命的看法，魯迅對政治，即使是左翼的政治活動一直持消極態度，為此也引起創造社和太陽社中人的抨擊，魯迅當然也不客氣地予以還擊。後來他的態度略有轉變，在一九三〇年的左聯成立大會講詞中，承認了革命文學，一九三一年受左聯五烈士事件刺激，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詞〉一文已正面使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一詞，亦即接受它背後的含意，其間在別的文章也有類似說法，相比二十年代中的懷疑和謹慎，這時魯迅對革命文學的態度完全不同，當中一九三一年的左聯五烈士事件應該是關鍵所在。

事隔兩年，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對事件仍表憤慨，也多次流露對殷夫（白莽）、柔石等青年的愛護和欣賞之情。正如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一文所說：「革命文學的旺盛起來，在表面上和別國不同，並非由於革命的高揚，而是因為革命的挫折。」²²魯迅改變過往對革命文學比較懷疑和謹慎的看法，同樣並非出於革命熱情的高揚，而是由左聯五烈士事件帶來的革命的挫折和感傷。

¹⁹ 安危〈魯迅和斯諾談話的前前後後〉，《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3期，頁15。

²⁰ 〈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座談會記要〉，《新文學史料》1988年第1期，頁214。

²¹ 同前註，頁216。

²² 《魯迅全集》第四卷，頁297。魯迅對於革命文學方面的思想轉變，詳見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的分析，湖南：岳麓書社，1999，頁155-172。

在斯諾訪問魯迅的一九三六年五月前後，不但是魯迅生命中的最後歲月，也是面對種種內憂外患的風雨飄搖之時。一方面有國民政府隨著抗日浪潮而加緊對左翼知識份子的迫害，另一方面左翼陣營本身也面臨分裂和傾軋，魯迅自己身體也受疾病困擾。

一九三六年三月，就在魯迅「大病初愈」之時，他收到自稱殷夫舊同學自漢口寄來的信，說準備整理殷夫的遺稿，出版詩集《孩兒塔》，希望魯迅寫序。殷夫是左聯五烈士之一，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中，首先提及他，然後才是柔石，也許因為魯迅與殷夫有著共同的喜好：愛讀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魯迅早在留日時期的〈摩羅詩力說〉中已介紹過裴多菲，而魯迅認識殷夫是緣於殷夫翻譯了裴多菲的詩，投稿到魯迅編的《奔流》，魯迅後來還送了兩本購自留日時期的珍藏了三十年的德文譯本裴多菲集給殷夫。殷夫生前編定的《孩兒塔》遺稿其實一直收藏在魯迅家中，魯迅收到來信後以為另有初稿，就寫了序言寄出，但後來至四月才知這竟是為騙取文稿的騙局，根本沒有出版殷夫遺稿這回事，於是魯迅另撰〈續記〉予以聲明。²³

出版《孩兒塔》的希望落空，魯迅必定很難過，因為這詩集別具意義，它一方面是魯迅所欣賞的左翼革命青年的遺作，另一方面也紀念著他們之間的師友情誼，以至魯迅對詩歌的真實關愛。序文的首段寫得有點傷感，也帶點《野草》式的散文詩情調：

春天去了一大半了，還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瀝瀝，深夜獨坐，聽得令人有些淒涼，也因為午後得到一封遠道寄來的信，要我給白莽的遺詩寫一點序文之類；那信的開首說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罷。……」——這就使我更加惆悵。²⁴

當然序文最重要的是末段提出對《孩兒塔》的評價：

這《孩兒塔》的出世並非要和現在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一種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²⁵

魯迅有意把《孩兒塔》從一般的詩集或革命文學的範疇中劃分出來，強調它是屬於別一世界，具有別一種意義。這是對《孩兒塔》的評價，也是魯迅晚年表達視詩歌為最後一片超越政治論爭和迫害，也超越一切名聲的淨土。

²³ 見《魯迅全集》第六卷，頁 495-497。發表時題為〈關於《白莽遺詩序》的聲明〉。殷夫《孩兒塔》直至一九五八年才能出版。

²⁴ 魯迅〈白莽作《孩兒塔》序〉，《魯迅全集》第六卷，頁 493。

²⁵ 同前註，頁 494。

然而魯迅也被騙了，他在四月才得知這是騙局。當五月斯諾來訪，內心失望、憤懣之情也許未全平伏。將《孩兒塔》的出版成空、序文騙局、對左聯五烈士的哀悼等事結合來看，加上對「魯迅式的偏激」的理解，才能了解魯迅在訪問記錄中的言論。我們大抵毋須孜孜於爭論訪問記錄的客觀性和準確度，魯迅的確在訪問中表達了對新詩的失望，然而這失望也是一種情感上對左聯五烈士的哀悼，即把革命的挫敗本身，以至這世界對詩人的種種戲弄，理解為一種詩的淨土的失落。

研究中國新詩的意義為何？手持由妻子擬定的孜孜提問中國新詩的問題單，斯諾在魯迅的答話間插入「魯迅認為研究中國現代詩人，純係浪費時間」一語，譯者安危認為那是斯諾向妻子的進言，「規勸妻子不要再去研究中國現代詩歌了」。無論斯諾的記錄是否魯迅本意，研究中國新詩，很可能真的只是浪費時間罷。從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發表新詩，到三十年代左聯五烈士遇害及殷夫詩集《孩兒塔》出版計劃成空，在魯迅眼中，是一種革命理念和純粹詩歌世界的雙重失落，而對中國新詩的命途來說，又何嘗不是一種預示？

「魯迅認為研究中國現代詩人，純係浪費時間。不管怎麼說，他們實在是無關緊要，除了他們自己外，沒有人把他們真當一回事，『唯提筆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詩人。』」——斯諾著、安危譯〈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

（《現代中文學刊》2010（1），頁 20-26）